

栾丰实考古文集

(四)

栾丰实 著



文物出版社

栾丰实考古文集

(四)

栾丰实 著

文物出版社

第四册目录

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1191
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分区·····	1202
再论良渚文化的年代·····	1213
论陆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年代·····	1233
试论广富林文化·····	1242
关于江淮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1259
关于苏鲁豫皖考古的几个问题·····	1262
论大汶口文化和崧泽、良渚文化的关系·····	1265
凌家滩与大汶口·····	1284
崧泽文化向北方地区的扩散·····	1296
良渚文化的北渐·····	1310
从镇江马迹山遗存看前期湖熟文化的年代·····	1320
试论裴李岗文化与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关系及其发展去向·····	1328
海岱系文化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从海岱、中原两大文化区系的相互关系谈起·····	1338
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	1348
论城子崖类型与后冈类型的关系·····	1365
二里头遗址中的东方文化因素·····	1375
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	1385
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分期和年代·····	1395
辽东半岛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	1405
论辽西和辽东南部史前时期的积石冢·····	1435
试论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中南部新石器及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	1450
2010年新石器时代考古·····	1464

2012年新石器时代考古·····	1484
两城地区考古及其主要收获·····	1514
《两城镇遗址研究》前言·····	1521
尧王城考古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	1524
夏鼐先生与甘青地区史前考古·····	1529
创建考古专业，引导学术发展——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奠基人刘敦愿先生·····	1535
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序·····	1540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集成之作——《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评析·····	1543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鸿篇力作	
——读《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	1551
史前聚落考古的新成果	
——读《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	1558
淮河中游地区文明探源的新进展——读《蚌埠禹会村》·····	1563
大汶口、良渚文化的汇聚点——读《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	1569
《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前言·····	1574
笃实远思、践行明智——栾丰实先生访谈录·····	1578
论著目录·····	1596

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自距今七千多年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独自体系的古代文化分布区，或可称为太湖文化区。它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孕育、诞生过程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继崧泽文化而起的良渚文化，则是这一文化谱系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良渚文化发现之初，曾一度将其归入龙山文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才把它从龙山文化中独立出来，并赋予良渚文化的名称，开始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70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和祭坛、殉人墓等重要遗迹的发现，令人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应恢复良渚玉器的历史地位，把它列为中华文明的标志^[1]。这些新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仅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更新了我们长期积淀而成的传统认识与观念。

既然良渚文化的地位与作用如此重要，那么它所存在的年代是首先应该解决的，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就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提出管见，以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参考。

一

由于缺乏大面积揭露的典型遗址和明确层位关系，从而给良渚文化的分期带来较大困难。依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的早晚趋势，以及与崧泽文化的远近程度，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以张陵山上层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与崧泽文化晚期极为接近，时代应当较早。而以雀幕桥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遗存则与崧泽文化差别较大，时代则应较晚。据此，我们从良渚文化各遗址中选择变化比较敏感、资料较为齐全（包括演变关系清楚和有共存遗物）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鼎、鬲、豆、壶、带流罐和带流杯等六类器物，进行类型学的分析与排比。

1. 鼎

变化比较清楚的是盆形鼎。依口沿、腹与足部的变化，分为4式。

1式 窄折沿，腹较深，鱼鳍形扁足。标本张陵山上层M4：26^[2]（图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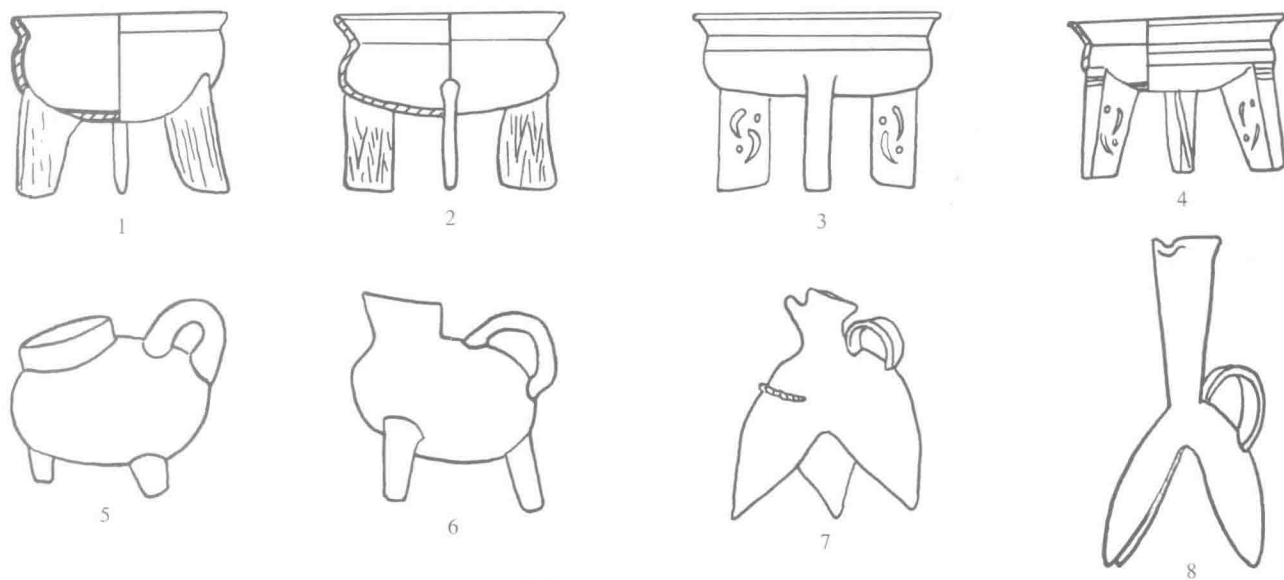
2式 折沿略宽，腹较浅，类鱼鳍形扁侧足。标本福泉山T23M2：48^[3]（图一，2）。

3式 宽折沿，浅腹较圆，丁字形足。标本福泉山T22M5：90（图一，3）。

[1] 邵望平：《史前艺术品的发现及史前艺术功能的演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第10期。



图一 鼎与鬲的演化

1. 张陵山 (M4: 26) 2、3、5. 福泉山 (T23M2: 48、T22M5: 90、T4M6: 32) 4. 草鞋山 (M198[I]: 2) 6、广富林 (M1: 3)
7. 寺墩 (T8: 1) 8. 亭林

4式 宽折沿，折腹，丁字形足。标本草鞋山M198[I]: 2^[1] (图一，4)。

盆形鼎的演变规律为：口沿由窄到宽，腹部从深到浅，口径由略小于腹径到大于腹径，三足则从鱼鳍形经类似鱼鳍形扁侧足，演变为丁字形。

2. 鬲

陶鬲在良渚文化器物群中数量不甚多，但特征鲜明，与海岱地区同类器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可分两型。

A型 实足鬲。分2式。

1式 矮颈，椭圆形腹，柱状实足。标本福泉山T4M6: 32^[2] (图一，5)。

2式 平流前端略高，颈稍长，扁圆形腹。标本广富林M1: 3^[3] (图一，6)。

B型 袋足鬲。分2式。

1式 口前端两侧内凹成流，矮细颈，下接锥状袋足，后侧袋足上部有鋡手。标本寺墩T8: 1^[4] (图一，7)。

2式 卷流，细长颈，下接细长袋足，鋡手多贴于颈根部与后侧袋足之间。标本亭林^[5] (图一，8)。

良渚文化陶鬲发现的不多，并且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参照海岱地区鬲的演化进程，可初步判定实足鬲（南京太岗寺出土的长颈实足鬲当属例外）较早，袋足鬲较迟。袋足鬲中1式较早，2式较晚。其演变是从实足鬲到袋足鬲，颈部由矮向高发展。

[1]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第2期。

[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考古》1962年第9期。

[4] 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3期。

[5] 黄宣佩：《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剖析》，《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图十二，3。

3. 豆

良渚文化的陶豆主要有浅盘豆和深盘豆两大类,资料较系统的为后者。可分5式。

1式 盘壁圆折,圈足粗矮。标本张陵山上层(图二,1)。

2式 盘壁方折,粗圈足略高。标本反山M18:28^[1](图二,2)。

3式 圈足略细并相对加高。标本福泉山T21M4:42(图二,3)。

4式 盘略深,圈足细高,柄部饰瓦棱纹。标本福泉山T27M2:2(图二,4)。

5式 盘较深,圈足细高。标本雀幕桥M2^[2](图二,5)。

豆的演化主要表现在:豆盘逐渐加深,圈足由粗矮向细高发展,豆柄上的装饰则从弦纹发展为竹节状瓦棱纹,镂孔渐次减少。

4. 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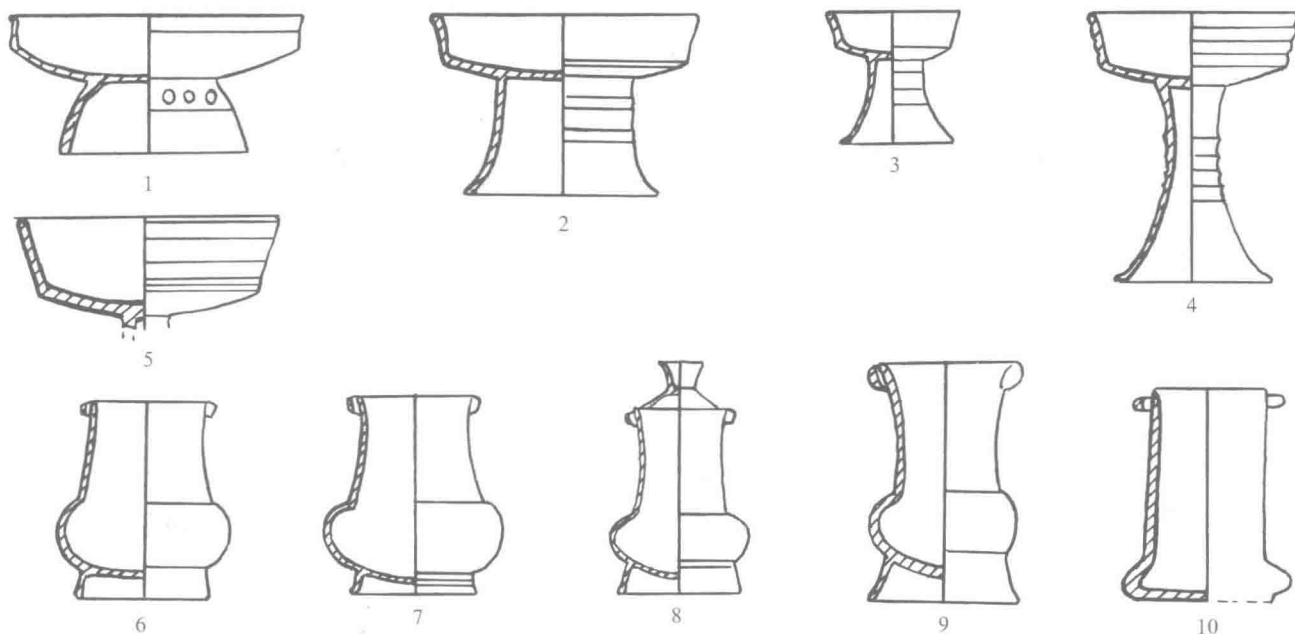
演变线路比较清楚的是长颈贯耳壶。可分5式。

1式 长颈微内倾,鼓腹较深,圈足或饰有扁长方形镂孔。标本越城M7:1^[3](图二,6)。

2式 长颈,口部微外侈,鼓腹略浅,圈足或饰镂孔。标本马桥M9:1^[4](图二,7)。

3式 长颈略细并微内束,鼓腹较浅,圈足略高。标本草鞋山M198[Ⅱ]:6(图二,8)。

4式 口外侈,长颈内束,鼓腹,圈足较高。标本雀幕桥M1(图二,9)。



图二 豆和贯耳壶的演化

1. 张陵山 2. 反山(M18:28) 3、4. 福泉山(T21M4:42、T27M2:2) 5、9. 雀幕桥(M2、M1) 6. 越城(M7:1) 7. 马桥(M9:1) 8. 草鞋山(M198[Ⅱ]:6) 10. 寺墩采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2] 嘉兴市教育局:《浙江嘉兴市雀幕桥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9期。

[3] 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4]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5式 长直颈，鼓腹甚浅。标本寺墩采^[1]（图二，10）。

贯耳壶的演化主要为：口部由内倾向外侈发展，腹部自深至浅，圈足渐加高，镂孔逐渐消失。

5. 带流罐

一侧有流，另一侧腹部有单把。底部有平底、三足和圈足三种，演变趋势一致。可分4式。

1式 斜流较短，矮颈，窄肩，圆腹，平底。标本张陵山上层M4：2（图三，1）。

2式 斜流，颈略高，肩稍宽，腹部外鼓，三足。标本越城M6：5（图三，2）。

3式 斜长流，颈增高，鼓腹，三足或圈足。标本福泉山T27M2：12（图三，3）。

4式 斜长流，颈较高，鼓腹，圈足。标本雀幕桥M1（图三，4）。

带流罐的演化趋势是：口由大到小，颈部从矮向高发展，腹部由圆腹到明显外鼓，底部则从平底到三足或圈足。

6. 带流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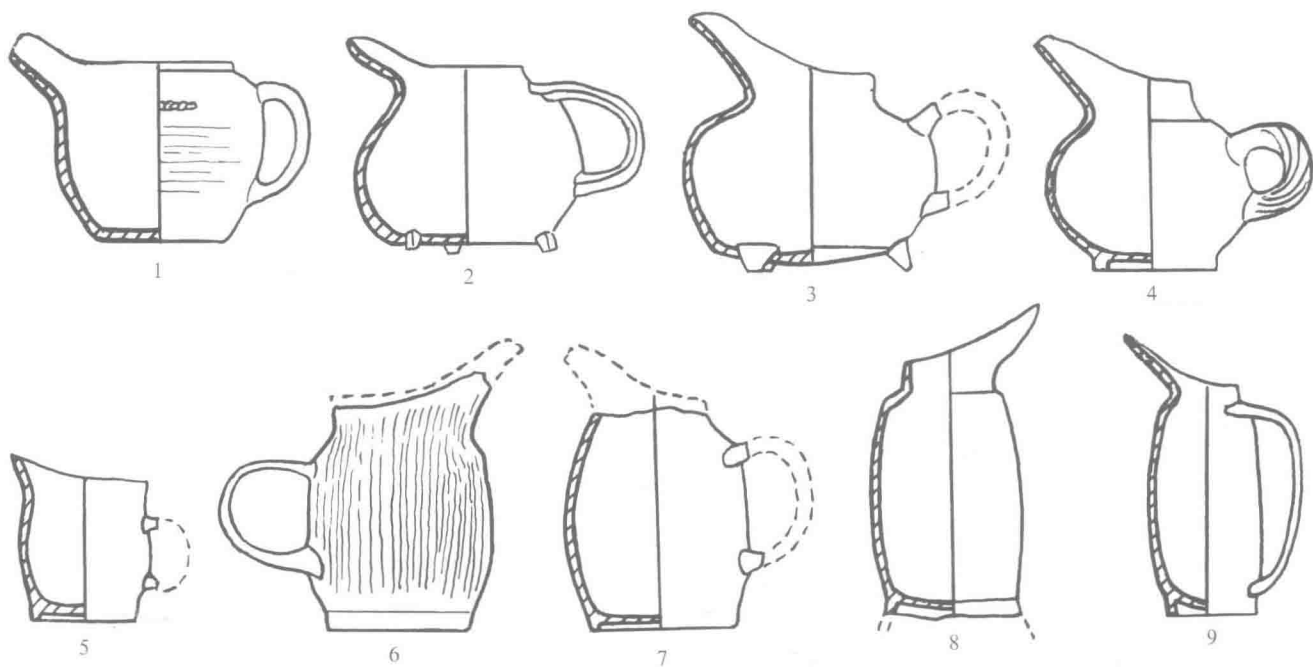
带流杯是良渚文化最富特征的器类之一，变化也极为敏感，是分期断代的理想器类。可分为5式。

1式 矮短流，颈不明显，杯体粗矮，把手上下间距较窄。标本福泉山T23M2：44（图三，5）。

2式 流较长，有颈。标本福泉山T22M5：2（图三，6）。

3式 斜长流，短颈，杯体较瘦，把手上下间距略宽。标本雀幕桥M2（图三，7）。

4式 长流斜高，细颈，杯体瘦高，把手上下间距较宽。标本雀幕桥^[2]（图三，8）。



图三 带流罐与带流杯的演化

1. 张陵山（M4：2） 2. 越城（M6：5） 3、5、6、9. 福泉山（T27M2：12、T23M2：44、T22M5：2、T15M3：112） 4、7、8. 雀幕桥（M1、M2、木板坑）

[1] 陈丽华：《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984年第2期。

[2] 浙江省嘉兴县博物、展览馆：《浙江嘉兴雀幕桥发现一批黑陶》，《考古》1974年第4期。

5式 长流斜高,束颈,杯体细高,把手上下间距甚宽。标本福泉山T15M3:112(图三,9)。

带流杯的变化规律为:流部由矮而短到高而长,口部从大到小,把手上下间距由窄到宽,整体从粗矮向细高发展。

二

50多年来,经过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不下数十处,比较重要的有上海市的福泉山、马桥和广富林等,江苏省的张陵山、越城、寺墩^[1]、草鞋山和澄湖前后湾^[2]等,浙江省的雀幕桥、钱山漾^[3]、反山和瑶山^[4]等。其中以福泉山公布资料最为丰富。

福泉山隶属上海市郊的青浦县,遗址为一高出地面约6米的土墩。1982年以来经多次发掘,收获颇丰。已发布资料的良渚遗存主要有10座墓葬,墓内除发现大量玉器之外,还有陶器80余件,发掘简报将这批良渚遗存划分为早晚两期。仔细分析这批墓葬材料,我们认为其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比较丰富,可进一步分期。

依据典型陶器的演化和器物组合的差异,福泉山良渚墓葬至少可以划分为依次4组,即:

第1组 以T3M2为代表,出有四系罐、鼓腹罐、圈足罐、贯耳壶和大口缸等。

第2组 以T23M2为代表,出有盆形鼎、浅盘高圈足豆、彩陶背壶、圈足簋、带流罐和带流杯等。

第3组 以T22M5和T27M2为代表,出有罐形鼎、盆形鼎、浅盘豆、深盘豆、贯耳壶、圈足罐、圈足盆、带流罐、带流杯和角把筒形杯等。

第4组 以T15M3为代表,出有盆形鼎、矮细足豆、圈足簋、罐和带流杯等。

福泉山4组墓葬之间,由于出土遗物较少,或本来某些组之间就有缺环,同类器形尚不能连贯下来。但从鼎、豆、壶、带流罐、圈足簋和带流杯等器形的演变关系看,4组间的相对年代关系还是可以肯定的,即第1组较早,第4组较晚。这4组分别代表着福泉山良渚墓地的四个阶段。

福泉山这批良渚墓葬之间没有直接的层位关系(指相互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由发掘简报可知,第1组时代最早。其余各组均分布于土墩之上,其中T23M2墓底距墩面2.2米,T22M5墓底距墩面1.78米,T27M2墓底距墩面1.65米,T15M3“距地表较近”。就深度而言,也以T23M2较早,T22M5和T27M2次之,T15M3较晚。这与前述按出土陶器排定的年代顺序是吻合的。我们知道,以深度来判定遗迹间的早晚关系是不科学的,因此这里仅援为参考,而并不作为划分早晚的依据。

福泉山第一阶段与张陵山上层比较一致。如两地的四系罐、圆腹罐、圈足壶和大口缸等形态较为接近,均具有崧泽晚期的风格。因此,两者的时代应大体相当,可作为良渚文化第一期。

福泉山第二阶段承之良渚一期,如盆形鼎、豆和带流罐等器类均有清楚的演变关系。可作为良渚文化第二期。

福泉山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衔接紧密,两段的器物种类也比较丰富,鼎、豆、壶、盆、带流

[1] 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2]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参考资料·9》,文物出版社,1985年。

[3]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罐、圈足簋和带流杯等均有传承关系，可以作为良渚文化第三期。草鞋山M198属于此期。

福泉山第三、四阶段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缺环。我们发现，雀幕桥良渚遗存恰好可填补于这两段之间。雀幕桥M1和M2的深盘豆、贯耳壶、带流罐和带流杯，与福泉山第三阶段的同类器十分接近而又有发展，时代应略晚。而1972年发现于雀幕桥木板坑内的陶器群又略早于福泉山第四阶段。鉴于材料还较少，我们暂将雀幕桥遗存作为良渚文化第四期前段，以福泉山第四阶段为良渚文化第四期后段。如果将来发现的材料丰富了，这一期或可再划分为两期。

如是，我们把福泉山、张陵山和雀幕桥三处遗址串连起来，将整个良渚文化划分为四期五段，这一分期所包容的时间跨度，基本上包括了目前我们所认识的良渚文化的发展过程。

越城遗址中层的7座良渚文化墓葬，曾与张陵山上层一起被作为早期良渚文化的代表。现在看来其时代并不单一。M4的年代较早，似已超出了良渚文化的范畴，对此已有人指出过^[1]，其余6座墓葬的年代也有早晚之别。大体说M1、M2和M7较早，这一组墓葬出土的鱼鳍形足罐形鼎、浅盘粗圈足豆、贯耳壶、卷沿圈足盆和圈足筒形杯，均与良渚一期类似，尤其是M1的圈足杯，与崧泽文化晚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因此，这一组墓葬的时代应属良渚一期或略偏晚。M6的圈足盆已成平沿，带流罐的流口斜长，颈部明显，具有良渚二期的风格。M3已出现丁字形足近直腹鼎和斜壁矮圈足豆，带流罐的流口上翘，颈部增高，其年代已到达良渚三期。

广富林的2座良渚墓葬年代接近，宽折沿丁字形足盆形鼎的腹部略深，斜壁豆的圈足粗矮，贯耳壶的口沿明显外侈，这些均为良渚三期作风，时代也应相当。

马桥遗址良渚遗存延续的时间略长，就墓葬而言，M1、M8、M9和M10较早，其时代属良渚二期的偏早阶段。M5的时代较晚，应为良渚三期。

寺墩遗址良渚遗存的年代较长，详细分期还有待于新的资料。M3的圈足簋为平折沿，深腹，圈足较矮，贯耳壶口沿外侈，腹较浅，圈足略高，假腹豆与深盘高圈足豆共存，其时代应属良渚三期偏早阶段。

反山是近年发掘的良渚文化重要遗址，尤以出土大量玉器而引人注目。陶器有鱼鳍形足罐形鼎、釜形甗、粗圈足豆、圈足罐和大口缸等，时代属良渚二期偏早阶段。

现将良渚文化主要遗址的年代关系对照如表一：

表一 良渚文化部分遗址期别对应关系表

遗址 期别		福泉山	张陵山	雀幕桥	越城	广富林	马桥	寺墩	反山
第一期		1段	上层		M1等				
第二期		2段			M6		M1等		M18等
第三期		3段			M3	M1、M2	M5	M3	
第四期	前段			主要遗存					
	后段	4段							

[1] 陈国庆：《良渚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三

关于良渚文化的年代,在其发现初期,曾一度将其归入到龙山文化系统,认为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向长江下游地区发展的结果,故又有龙山文化杭州湾区和浙江龙山文化的提法。随着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同时或略晚的看法,已被良渚文化的上限略早,下限与龙山文化大致相当的意见所替代。

由太湖文化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我们已确知良渚文化的相对年代要晚于崧泽文化,并直接继承崧泽文化而来。至于良渚文化的去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不过其早于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现有碳-14和热释光两种方法测得的数据22个。

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有15个。

张陵山上层木炭	3835 ± 240
青墩树根	3455 ± 110
钱山漾T22④层稻壳	3310 ± 135
钱山漾乙区④层木杵	3305 ± 135
青墩木炭	3285 ± 125
安溪T3④层木头	2870 ± 180
龙南F1稻谷炭	2800 ± 165
寺墩T108炭粒	2790 ± 230
钱山漾T16③层千篲	2760 ± 140
钱山漾T13④层竹绳	2630 ± 140
风溪T6④层木头	2555 ± 145
雀幕桥木棹板	2380 ± 145
亭林T1②层木炭	2250 ± 145
辉山M2木质葬具	2130 ± 100
亭林T4M12人骨	2005 ± 165

热释光法测定的年代数据有7个,标本分别采自马桥和亭林两遗址,其年代在公元前2600~前1970年之间。

根据上述测定的年代数据,许多人提出了自己对良渚文化绝对年代的看法,归并一下,主要有五种基本的认识。

- (1) 距今年代大约在5500~4000年之间,延续了1500余年的时间^[1]。
- (2) 距今约为5350~4150年,大体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历程^[2]。
- (3) 在距今5260~4080年之间,前后延续了1300年左右^[3]。

[1] 南京市博物馆:《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

[2] 安志敏:《关于良渚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1988年第3期。

[3] 牟永抗:《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任式楠:《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出处同前。《良渚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4) 上限在距今4700年, 下限不迟于3900年, 大约延续了800余年^[1]。

(5) 早期在距今4400年左右, 晚期在3995±95~3840±95年之间, 前后延续500~600年^[2]。

在上述诸看法中, 持第(2)(3)种意见的人较多, 即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在距今5300~4000年之间。对此, 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四

黄淮下游的海岱文化区和长江下游的太湖文化区, 地域毗邻, 又分别存在着自成体系并且十分发达的史前文化。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 两文化区之间就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与良渚文化时代相近, 共同因素较多的主要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

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已经明确, 各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也细致清楚。据近年来的研究, 我们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又细分为四期七段^[3], 把龙山文化划为六期^[4]。这样, 从公元前3500~前2000年之间, 各期前后衔接, 环环相扣, 基本上不存在缺环。如果将其同良渚文化比较, 既可以探讨两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又可借以辅助确定良渚文化的年代。

大汶口文化中中期可再细分为两期, 中一期以大汶口墓地早期^[5]、野店四期^[6]和花厅一期^[7]等为代表, 中二期以大汶口墓地中期、西夏侯M4^[8]和花厅二期等为代表。大汶口文化晚期亦分为两期, 晚一期以大汶口墓地M47和M10、野店M66、西夏侯M8和花厅三期等为代表, 晚二期以大汶口墓地M25、西夏侯上层墓、野店M62和M51等为代表。晚二期的直接后续为龙山文化一期。

良渚文化中的大汶口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文化遗物方面, 这些遗物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比较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遗物(图四, 1~5), 这一类的数量较少。例如, 福泉山出土的彩陶背壶(T23M2: 46), 造型纹饰均与大墩子M107: 1相同^[9], 前者属良渚二期, 后者为大汶口中一期后段。海安青墩良渚一期墓发现的厚胎高柄杯(M43: 6)^[10], 与大汶口中一期的同类器也完全相同。澄湖前后湾良渚四期前段的盃(J03: 1)、南京北阴阳营的高颈盃^[11], 分别与属于大汶口文化晚一期的花厅M5: 14、野店M66: 3相同。第二类为接受自大汶口文化并加以改造, 从而具有一定自身特色的遗物, 主要有实足鬲和袋足鬲(图四, 3、6), 前者见于福泉山、广富林、马桥和寺墩等遗址, 属良渚二、三期, 后者见于寺墩、雀幕桥、澄湖前后湾、亭林、果园村和钱山漾等遗址, 主要为良渚四期。类似的实足鬲在大汶口文化中主要流行于中一期后段和中二期。1式袋足鬲则与大汶口文化

[1] 黄宣佩:《关于良渚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 蒋赞初:《对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的再认识》,《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

[3]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栾丰实:《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的分期及其源流》,《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5]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6]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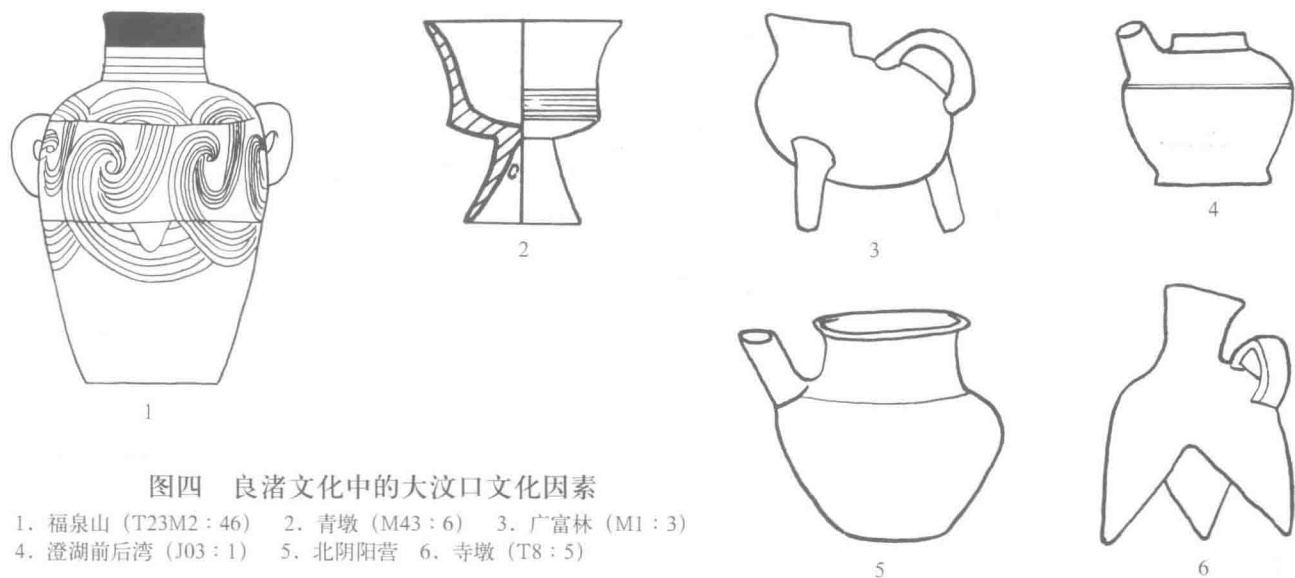
[7] 南京博物院:《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年第2期;栾丰实:《花厅墓地初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9]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0] 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11]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1期,图版拾贰,4。



图四 良渚文化中的大汶口文化因素

1. 福泉山 (T23M2:46) 2. 青墩 (M43:6) 3. 广富林 (M1:3)
4. 澄湖前后湾 (J03:1) 5. 北阴阳营 6. 寺墩 (T8:5)

的乳状袋足鬶类似，后者属大汶口晚一期。良渚文化的2式袋足鬶比较特殊，就颈部显著加长的特征，与大汶口晚二期鬶的作风相似。同时，在安徽肥西古埂遗址^[1]发现同类鬶与大汶口晚二期的黑陶高柄杯共出，故可推定2式袋足鬶约当大汶口晚二期阶段，即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末期。此外，良渚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的土坑竖穴墓，与一直流行地堆土掩埋死者的习俗明显不同，表明埋葬制度有了重大变化。这种挖穴埋葬死者的新做法，或许与大汶口文化有关。

大汶口文化因素在良渚文化中比较少见，所占地位并不突出。因此，对大汶口文化给予良渚文化的影响不能估计过高。由深入到良渚文化内部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可知，良渚一、二期大致与大汶口中一期相当，良渚三期与大汶口中二期同时，良渚四期前段则与大汶口晚一期是平行发展的。良渚四期后段遗存目前发现尚少，不过从前后关系和发展速度分析，可能与大汶口晚二期相当。

大汶口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比较浓厚，这种现象主要见于鲁南苏北和沿海一带。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典型的良渚因素，易于辨别的主要为文化遗物。这一类的种类与数量均较多，除陶器之外，还有玉器和石器（图五，1~10、13）。属于大汶口中一期的有粗矮体贯耳壶，见于花厅和野店等处，形制与良渚一期的张陵山上层M5:25极为接近；长颈贯耳壶，发现于大墩子、呈子^[2]等遗址，形态与良渚一期偏晚的越城M7:1、良渚二期的马桥M9:1相似；有段石铤主要见于花厅等处。属于大汶口中二期的有长颈贯耳壶，见于花厅和呈子等遗址，形态与良渚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折腹盆形鼎，鼎身与良渚三期的草鞋山M198[I]:2相同，上宽下窄并划有纹饰的瓦状足与良渚三期的广富林M1:4也完全一致，尽管良渚文化也少见这种瓦足，但其渊源则可追溯到崧泽时期；浅盘豆，主要见于花厅遗址，与良渚三期的福泉山T22M5:93类似；带流杯，发现于花厅等遗址，与良渚三期的福泉山T22M5:2相近；玉琮，仅见于花厅遗址，与寺墩M3:43、福泉山T4M6:21完全相同。此外，还发现有琮形玉管、外表饰简化神人兽面纹的玉锥形器（或称玉坠）和有段石铤等。属于大

[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肥西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

[2] 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图一〇，12。



图五 大汶口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

1、4~9. 花厅 (M20:40、M18:13、M19:15、M20:35、M18:46、35、M16:5、1) 2. 野店 (M31:10) 3. 大墩子 (M302:1) 10. 杨家圈 (T41④:31) 11、13. 大汶口 (M78:6、M4:21) 12. 三里河 (M2110:33)

汶口文化晚期的有“鼎鬲”、丁字形鼎足^[1]和有段石铎等。第二类为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或对原器形加以改造，但仍可分辨出其来源者。此类发现的数量不多（图五，11、12），主要有长颈贯耳壶，为平底，双耳也从口沿外下移至颈中部或偏上，见于大汶口等遗址；管状流筒形单耳杯，造型与良渚文化的带流杯无异，唯流变为管状，见于胶县三里河^[2]。在装饰方面，大汶口文化中也有许多良渚文化的因素。如玉器中的分节简化神人兽面纹，陶器中流行于豆柄、圈足和壶、罐等器类上的瓦棱纹、扁长方形（或扁椭圆形）镂孔以及其他器类上的点状纹、由两个三角和一个圆孔合成的组合纹饰等。

此外，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还存在一部分双方均有一定数量的器类，主要有罐形豆、圈足罐（或壶）、四系小口罐、贯耳壶、大口圆底厚胎缸、喇叭形大口折肩尊、有肩石钺、玉锥形器、玉镯、玉璜以及其他小件玉器。这些器类，或大汶口文化发现略多，或暂多见于良渚文化，它

[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

们如同两文化常见的黑皮陶一样,目前尚不宜结论为谁受谁的传播与影响。但这类遗物的存在,表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时代相近,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双边关系。

总之,与大汶口文化对良渚文化的影响相比,良渚文化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要强烈得多,其施加影响的领域也不断拓宽,它包括了生产与生活两大方面。玉琮的发现,证明这种影响在精神文化领域内也占有一定位置。同时,也更加明确了良渚文化与大汶口的年代对应关系,即良渚文化一、二期与大汶口中一期大体平行,良渚文化三、四期分别与大汶口中二期和晚期相当。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起止年代比较清楚,大约在公元前3500~前2600年之间,中晚期的分界约在公元前3000年,这不但有碳-14年代数据为证,而且从大汶口文化中期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或称秦王寨类型)时代相当,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同时也可得到佐证。因此,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应为:一、二、三期约从公元前3500~前3000年,四期约从公元前3000~前2600年前后,其下限或可略晚,前后延续了近1000年的时间。

在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由各自存在对方的文化因素所反映的这种年代对应关系,早在十几年之前已有学者指出过^[1],可惜当时并未给良渚文化以应有的位置,而是把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下推到与二里头文化同时,以此来适应良渚文化属于龙山时代的普遍看法。实际上,至少是我们目前所认识的良渚文化,应属早于龙山时代的仰韶时代晚期,它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仰韶文化三、四期^[2]是平行发展的。兹将三者之间的年代对应关系对照如表二:

表二 太湖、海岱和中原文化区部分考古学文化年代关系对应表

年代(B.C)	太湖文化区	海岱文化区	中原文化区
3500~3000	良渚一至三期	大汶口中期	仰韶三期
3000~2600	良渚四期	大汶口晚期	仰韶四期 (庙底沟二期文化)

至于龙山时代的太湖流域地区,是良渚文化的延续,抑或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现在还难遽定。因此,目前还无法将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比较。有的同志将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的“鼎鬲”和丁字形鼎足,作为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传播交流关系的一种证据^[3],恐怕是一种误解。因为上述良渚因素均出自大汶口文化晚期堆积之内。

我们也注意到,在钱山漾遗址T13④层内曾发现一件残陶鬶(见《考古学报》1960年2期78页图四、2),形制为粗长颈鼓腹,腹部并有泥饼装饰,为山东龙山早期特征。因为钱山漾第四层比较复杂,与陶鬶共存的器物尚不清楚,眼下还无法判断其整体面貌,或许良渚文化已延续到了这一时期(指龙山早期),但其晚于前述良渚四期似无疑问。

(原载《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

[1] 南京博物院:《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的探析》,《文物》1978年第4期。

[2] 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3] 吴诗池:《试论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分区

良渚文化延续和发展了长达近千年之久,要讨论其社会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分期和年代。对此,以往已有许多学者直接或间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1]。由于良渚文化一直缺乏具有分期意义的层位关系,所以各种划分意见之间,尤其是年代的估定上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1990年,笔者在分析江苏新沂花厅墓地新资料的文化性质时,曾对良渚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做过简要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2]。当时所划分的四期五段,现在看来,五段的前后顺序仍基本成立。但是,由于当时公开发表的资料太少,尤其是缺乏第四期的资料,所以在期别的归并上不尽合理,当时文中已指出过这一点。近几年来,新的资料,尤其是晚期的资料增多,可以对以前的意见做出充实和修正。

经过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包括墓地),已达数十处之多。在这些遗址中,就遗址延续时间的长短和公布资料的丰富程度等具有分期意义的条件而言,以上海青浦县福泉山遗址最为典型。下面拟从分析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的分期入手,进而讨论其他遗址的期别,最终对良渚文化做出综合分期,并结合已有碳-14测年数据和与其他文化的比较,大致推定其年代。

1. 福泉山遗址

位于青浦县东北部,为一高出地面约6米的土墩。1982~1988年,上海市博物馆先后三次发掘该遗址,揭露面积2150平方米,共发现和清理良渚文化墓葬32座^[3]。这批墓葬分别发现于三层文化堆积之内,尤为重要的是发现3组叠压打破关系,即:

(1) M94 ⇒ M126

(2) M101 ⇒ M132 ⇒ M135 ⇒ M139 → M143

[1] 论述良渚文化分期的论文主要有:黄宣佩:《关于良渚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论良渚文化的分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陈国庆:《良渚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吴汝祚:《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关系》,《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孙维昌:《良渚文化陶器纹饰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文物》1995年第5期;中村慎一:《中国新石器时代の玉琮》,《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8,1989年;渡边芳郎:《葬送礼仪と阶层性》,《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第4号,1994年。

[2] 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

[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第2期;《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第10期;黄宣佩、张明华:《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黄宣佩:《论良渚文化的分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left. \begin{array}{l} (3) \text{ M144} \\ \text{M146} \end{array} \right\} \Rightarrow \text{M145}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text{M149} \\ \Rightarrow \text{M150} \Rightarrow \text{M151} \end{array} \right.$$

($\Rightarrow$ 表示叠压, $\rightarrow$ 表示打破)

3组层位关系中,第(1)组M94未公布资料,第(3)组已发表的资料,缺乏可以比较的同类器物,故暂搁置。下面重点分析第(2)组。

第(2)组有5座墓葬连续叠压和打破。其中,M135仅公布1件粗柄豆,与其他墓缺乏可比性。此组中最早的M143,出土的鼎为鸭嘴状菌形足,与崧泽文化晚期的类似。打破M143的M139,釜形鼎的足体侧扁,上宽下窄,足根外拐,外缘呈齿状,与崧泽文化晚期的同类鼎足相近。但其足尖部又略宽且微外卷,已显露出鱼鳍形足的韵味。该墓出土的壶形豆也明显具有崧泽文化晚期风格,而同出的器体略扁的带流阔把罐和圈足盘(或称豆),则为良渚文化早期作风。所以,如果M143也属于良渚文化的话,那么两座墓的时代应相隔不远,可作为一组看待。M132和M101的出土物各具特征,差别较大,显示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年代间隔。这样,此组叠压打破关系中的五座墓葬,至少代表着良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三个时期。从出土遗物的特征观察,M132和M139的时代较为接近。例如:两者釜形鼎的形态一脉相承,同类圈足盘之间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两者的年代相隔不远,基本上可以衔接。而M132和M101则不然,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缺环。

进一步扩展分析,M74、M65和M136三座墓葬,均出形态相近的“T”字形鼎足、长颈浅鼓腹的双鼻壶等,时代应大致相当。“T”字形足是由鱼鳍形足发展而来,因此,M74等较之以鱼鳍形足为主而微露“T”字形端倪的M132显然要晚。同时,从双鼻壶和三足带流阔把罐的形态看,M74等又早于M101。所以,可将M74等插入M132和M101之间,从而填补了两者之间时间上的缺环。还有两座比较重要的墓葬需要稍加讨论,即M67和M60。M67出有浅腹盆形鼎,下附类似鱼鳍形的扁方足。扁方足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应是鱼鳍形足的发展形态,在大的分类上可归入鱼鳍形足之内。该鼎的腹部也较之M65的同类鼎略深,肩部则无弦纹,其时代应略早于M74等的标准“T”字形足鼎。M67、M60的带流阔把杯为大口束颈,器体粗矮,形态与M74等的细颈略长同类杯也有所区别。M60的三足带流罐器体略扁,矮颈矮足,在发展趋势上应略早于M74等颈部明显加高的同类罐。按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年代相仿的M67和M60,应略早于M74等墓葬,但又晚于M132。这里仍将其归入M74等之内,合成一大组,以后材料丰富了,可以在其中单列为一组,代表一段时间,时代介于M132和M74之间。

福泉山M40出有盆形鼎、豆、带流杯、圈足簋、罐和器盖等,还有玉钺、玉璧、玉琮和玉锥形器等。除了豆之外,与已经发表的M101的器物没有相同器类,并且两者共有的豆也非同型。不过,如果将M40与M74等相比较,则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例如,M40盆形鼎的“T”字形足,外侧面更宽;豆的圈足粗高,豆盘浅而下角圆折;带流阔把杯的杯体细长,把手上下甚宽;圈足簋的口缘外斜,器体变矮而圈足显著升高;器盖的外缘加宽,上附半环形钮;玉琮外表的“神徽”极度简化,甚至出现象征眼的圆圈和象征嘴的椭圆形突起在近乎一条直线上的现象。这些特征更不见于M132等,与M74等也差别显著,显然为晚出,从与M74等的接近程度分析,应晚于M101。

综上所述,福泉山的良渚文化墓葬,可以划分为各具特征的五组,它们分别以M139、M132、